

王充新八论续编

邓红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充新八论续编

邓红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充新八论续编/邓红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2

ISBN 978 - 7 - 5004 - 6088 - 6

I. 王… II. 邓… III. 王充 (27 ~ 97) — 哲学思想—研究 IV. B234. 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6878 号

责任编辑 郭 媛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审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

插 页 3

字 数 240 千字

定 价 23.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邓红,男,1958年生,四川合川(现重庆市合川)人。1977年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1982年1月毕业后,曾在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和西南师范大学任教。1987年赴日本。1988年4月考入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史专业硕士课程,师从日本著名秦汉哲学史以及日本汉学史专家町田三郎先生。1990年以《王充的气论研究》为题获文学硕士学位;1990年考入博士课程,1995年以《董仲舒思想研究》为题获文学博士学位。1995年9月被日本大分县立艺术文化短期大学直接聘为副教授。2001年被聘为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著有《董仲舒思想之研究》(日文,人与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王充新八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并撰有中国哲学史以及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单篇论文数十篇、译文十余篇。另撰有关于中日关系以及日本现代政治文化方面的论文十余篇。日本中国学会、东方学会、中国出土资料会等学会会员。



邓红、故冈田武彦先生和郭齐勇先生 2003 年 6 月 20 日晚在日本
福冈市南区向野 2 丁目“纳言”酒店的合影

序

邓红兄是我的学长，虽然我痴长他十余岁。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刚刚恢复高考的年代，我们都在珞珈山下读书，他是1977级历史系的，我是1978级哲学系的。彼时，这两个年级的学生中，相差十余岁，一点也不稀奇。那时邓红年轻，很有思想活力，好辩，与我们班上的几位小同学是踢足球的朋友，爱玩。我提前半年毕业，与他们年级的同学一道考上1981级研究生，从此开始走上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的道路。他本科毕业后先执教于四川，后于1987年负笈东瀛，次年考上九州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的硕士课程，师从金谷治先生的高徒、著名学者町田三郎先生，继而于1990年考上博士课程，于1995年获文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董仲舒思想之研究》已在日本出版。此后，他在日本教书。他有时给业师萧萧父先生通信求教，寄赠论著，得到萧老师的赏识与器重。我是从萧先生处知道他是我们的同行的。他也常与冯天瑜先生相过从，被我校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聘为兼职研究员。

2003年4—7月间，应日本关西大学吾妻重二教授的邀请，我在关大的东西学术研究中心做研究。此期间在邓红兄的邀请与陪同下，我与内子游历了九州。特别难以忘怀的是，那次实现了我的夙愿，拜会了世界著名的中国哲学专家岡田武彦先生。6月

2 王充新八论续编

20日晚上6点至8点半，我们在福岡南区向野2丁目的纳言酒店拜见了95岁的岡田先生。在我的心目中，岡田先生是当代的圣人。他的弟子难波征南先生与其子陪同岡田先生来了。岡田先生清瘦，行动自如，上二楼也不费劲，精神很好。我们迎上前去互致问候。他听说从阿苏山至福岡，一路上内子晕车，便连连向内子问候。岡田先生送我及邓兄字幅各一件。上面写着：“崇物此二字是千古神人相传之真诀，而学之终始学其须要兀坐以培其根也 平成十五年春 武彦书”。上款印章为他的老师楠本正继的“归静”，下款印章为“斯人舍主人岡田武彦之印章”。接着我们与先生合影，其中有一张照片记录了邓兄与我拉着白布字幅拥着岡田先生的情景。

岡田先生多次到过中国，凡王阳明去过的地方，他都去过了。贵州龙场，他去过三次。据说他老人家的足迹遍及我国八省区、八十余县市，行程两万余里。先生亲自捐款，又大力募款，修复王阳明遗址多处。

入席以后，岡田先生一边介绍日本清酒与菜肴，一边与我交谈。他问我的研究方向，难波先生介绍了我关于熊十力及现代新儒学的研究，出土简帛中的儒道思想研究等。席间谈到哈佛大学杜维明先生，他让我代问杜先生好，又说好久没有与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先生联系了。我给他讲了我所了解的狄百瑞、杜维明二先生的近况。

岡田先生对我说：东洋思想要慢慢地理解，要悠闲，不能太赶忙。光凭一点聪明、灵机是不能做大学问的。将来东洋思想一定要弥补西洋思想。

我请教岡田先生“崇物”及“崇物”与“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联系。他说，宋儒讲“居敬”，他晚年体会“崇物”比“居敬”更深入一步。先生尊重物，认为万物都有某种精神

性，即物有物格。这是针对西方把物仅仅看作物质，“支配物”、“征服物”的思想的。先生此说与中国古代人认为物有神性的思想一致。他说身体既是躯干又不是躯干，是形上与形下的一体之物。他强调兀坐，认为兀坐比静坐、枯坐好，兀坐是身为主，心为仆，静坐乃是心为主。兀坐打破了主客对待。兀坐使人洒落，心物一体。兀坐是简素工夫。岡田先生追求物我一体，无我无神的境地，我也是物，物也是我。无我，就是原来的我。中国思想、日本思想都是感谢物，没有物，就没有我。我曾读过记录张岱年先生与岡田先生北京对谈的一本书《简素与和合》。其书刊发有钱明翻译的岡田先生的谈话，其中有：“天地万物会归于心，心归于身，身是心之本源，宇宙生气之充实处也。故曰学也者，身学也，致身尽焉。然初学者，宜兀坐以培其身命之根，应宇宙在手，万化生身，其功切至矣。”

岡田先生又问我对阳明、朱子的看法，我说在“崇物”“万物一体之仁”上，二者是一致的。先生对我讲，是有一致性，但阳明、朱子毕竟有差别，最好保持其独特性与差别，不要失掉其独特性。好比中国人、日本人不同，有差别，大家彼此尊重。现在西洋思想是强势，张牙舞爪，我们要以东洋思想去纠正其弊，可以得到新的发展。这是共生共存之道。

岡田先生对我说，把东洋思想用形式逻辑整理出来以后，越说越难以理解。要让西洋人慢慢去理解东洋人的思维方式。就像日本人的相扑，怎么抱，怎么使劲，这是要内在感触、体验的，这一运动要进入世界体育比赛项目，它不是西洋的体育比赛。他说，东洋思想是根，没有根就是无本之木，西洋思想是干、枝叶，然后结合起来才有花朵、果实。他又说，要更多地发扬东洋思想，拯救西洋的弊病，就是靠东洋思想。

岡田先生赐宴，面授“崇物”之论，是我那次日本之行最

4 王充新八论续编

高最有意义的事，我很佩服老先生的学养与境界。他 90 高龄还在为日本小朋友讲《论语》。岡田先生就是宋明儒的现代版，其人格与思想都值得我们崇敬。这要谢谢难波先生、邓红兄的安排和翻译。次年，岡田先生与张岱年先生相继去世。岡田先生 1908 年生，张先生 1909 年生，两位先生都是我十分敬重的前辈。

邓红兄研究的方向是汉代哲学思想，曾于 2001 年在北京的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2003 年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充新八论》，此外还在日本及我国的大陆与台湾发表了数十篇论文与译文。

学长王素研究员是我校前辈大家唐长孺先生的高弟，他有乃师风，是一位严谨的学者。王素先生的《王充新八论》序中的评价应当是公允的。邓著指出，胡适对王充“疾虚妄”一面的拔高（未曾注意到王充亦受到“虚妄”的影响），是日后我国大陆学者高抬王充之滥觞。王充有关“命”、“气”的看法十分繁复，作者下了很大功夫加以辨析，指出王充并没有脱离汉儒之藩篱，是一种纯粹的“天人感应论”者。作者对王充的“颂汉”论予以揭示，对其鬼神论、“天地”观予以分析，对《论衡》所反映的王充思想作了全面、深透、细致的研究，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邓著的确是翻案文章，对中国内地学界以前给王充贴上的诸如“科学”、“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标签，给予了驳正。邓著《新八论》昭示了一个道理，要真正把握一位古代思想家，必须从材料入手，全面而深细地爬梳资料，不要人云亦云。

一个多月前，邓兄把新著《王充新八论续编》的书稿，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并且命我写序。我个人对汉代哲学思想比较陌生，没有资格写序，但拗不过学兄，只好遵命而行。《续编》

接着前书，进一步讨论王充的天命论、“自然”论及天人感应的祥瑞说。作者对王充的“天”、“气”、“命”、“阴阳”、“五行”、“鬼”、“神”等范畴、观念的把握，没有脱离汉代的社会历史与思想的背景，这恰恰是实事求是的，恰恰是符合唯物史观的。

《王充的客观天命论》，考察先秦诸家及汉代董仲舒的“天”与“天命”之论，并与王充的说法相比较，认为王充的“命”即“天命”，其“命”与其“天命”论即“自然之道”、“适偶之数”。作者说这是一种超人间的力量，是一种泛神论的，或有神论的。

《王充论“龙”》，认为王充的龙论具有神灵性、天人感应性和表现汉王朝君主的神圣性，“龙”论又与王充的“命”、“气”、“颂汉”、“天地”、“妖祥”以及“疾虚妄”的批评论密不可分。

《王充“符瑞”考辨》，以“凤”为中心，进一步考察王氏符瑞论，指出这也是与“命”论和“颂汉”论相符合的。

《王充论汉高祖》指出，王充对有关高祖的几大神话是深信不疑的。不但没有任何怀疑，他还以这些神话为武器和材料，来证明他的天命论、颂汉论和鬼神妖论（除“人死为鬼”论以外）。王充的无鬼神论只是反对“人死为鬼”，而并不反对其他的鬼神妖论。不但不反对，反而还提倡论说一些鬼神妖论。

《关于“自然”的涵义——以王充为中心》、《王充论“自然”》集中讨论王充的“自然”范畴。作者认为，王充的“自然”已经不是对某种事物的形式、构成、运行、发展的“自然而然”的状态的形容和表现，而是对所有的事物进行解释说明的工具和方法，究明其存在运行以及规律的原因的解释系统。王充已将“自然”上升为了方法论，企图用之来解释所有的世界的所有的事物。以王充为代表的一派思想家，将“自然”上升

为了与“阴阳”“五行”一样的方法论。此外，王充的“自然”，既被说成是“天道自然”，即必然性，但有时又指的是偶然性。两者之间的对立和矛盾统一于他的“奉天命推自然”之“命”论。王充所说的“自然状态”有着静态和动态这两种存在方式。作者的探讨，采取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办法。所谓纵向的探讨，是指作者一直坚持的方法，即在探讨王充的每一个思想片段时，都要全面检讨《论衡》84篇文章的每一篇文章对该问题的论述，而不去断章取义地引用。作者对《论衡》各篇的“自然”的使用情况作了全面检讨，其在每一篇里的涵义都有所不同，内容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所谓横向性探讨，是将《论衡》84篇文章中有关“自然”的论述串联起来，检讨它们有着哪些方面的倾向。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做学问的态度与方法。

《王充是“合理主义者”吗？——日本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合理”与“合理主义”》则针对日本学术界的“合理”、“合理主义”和“王充是合理主义者”的说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希望，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领域中，应该不再使用，至少是重新检讨诸如“唯物主义”、“合理主义”、“科学的”、“异端的”、“道家的”、“历史的”之类的“过滤嘴”，特别是“合理主义”这样的西方哲学史上的特殊概念，这样才能在21世纪的王充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不再蹈错误的覆辙，不再复制出和20世纪雷同的王充研究和哲学史研究的东西来。

日本的王充研究之一和之二篇介绍了日本的王充研究。

我对邓红兄这两种王充专书给予很高的评价。尽管我不同意有的“命”与“天命”的混同，希望作者对孔子、董仲舒、朱子的“天”与“天命”的看法还需作体认与更细致的理解，尽管我认为本书批评的现象已成为历史，不会卷土重来，而且书中有些提法仍值得斟酌（例如说台湾学者叫“气一元论”云，显

然来自大陆学者)，但我仍认为邓兄这两部书确实是目前最值得称道的王充研究的新成果，的确厘清了数十年来有关王充研究的一些似是而非之论。邓红兄把王充研究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是为序。

郭齐勇

乙酉年立冬日前后于珞珈山麓

自序

这本《王充新八论续编》，顾名思义，是我的《王充新八论》^①的续编，而且也凑足了八篇。

《王充新八论》出版以后，除了在台湾出版了一本《日本的王充研究论著目录编年提要》（知书房 2005 年版）外，再就是陆陆续续写下了这些文章。关于每一篇文章的写作历程，我都把它们记入了每一篇文章的“缘起”部分。

《王充新八论》出版后，流传得非常广泛，有些反响，因而也得了“酷评”。

《王充新八论》里面也有一些破绽，最大的破绽就是提到“胡适的《王充的论衡》是民国 19 年即 1930 年的作品”。胡适的《王充的论衡》确实是 1919 年的作品，我是画蛇添了足，把 19 年弄成“民国 19 年”了。

但是读胡适的《王充的论衡》以及他 1918 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卷上”），确实得到了许多东西。我们知道，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出版时轰动学术界，觉得他把三皇五帝砍去直接从老子孔子讲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在顾颉刚等人看来甚至是有骇人听闻之感（请参见顾颉刚《古史辨》

^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2 王充新八论续编

序)。然而在近 90 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便会发现这些其实都并不是胡适的发明。胡适只是打了一个时间差而已。此话怎讲？

我在本书的“王充是‘合理主义者’吗？”这篇文章中曾经提到，其实日本早在 1881 年（明治 14 年）就针对“西洋”的“哲学”，发明出“东洋”“哲学”的名称，在大学开设了“东洋哲学”之名的讲座。1881 年，东京大学在“和汉学科”中设立“印度·支那哲学讲座”，1883 年井上哲次郎正式开设“东洋哲学史”讲座，并出版了《伦理新说》和《西洋哲学讲义》。日本最早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是内田周平在 1888 年出版的《支那哲学史》，1898 年早稻田大学教授松本文三郎整理其讲义出版了第一部完整的《支那哲学史》（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其后，1900 年（明治 33 年）远藤隆吉出版了《支那哲学史》，1903 年出版了《支那思想发达史》。1903 年宇野哲人的《支那哲学史讲话》^① 上梓，其后几乎每年再版，为日本影响最广泛的教科书。

我们知道，日本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影响颇大。如果以 1868 年的明治维新为日本近代化的开端，以新文化运动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开端，中国比日本将近晚了 50 年。在文化上，东京大学成立于 1868 年，而中国 1905 年才废除科举，此时日本文科的学科分野早已是文史哲泾渭分明，各种教科书全盘西化。翻开宇野哲人 1903 年编写的那本《支那哲学史讲话》，我们会发现它的第一章是“唐虞三代概说”，讲了唐虞的政治、洪范、周代的概说、周末的两大思潮和诸子百家；第二章是“周易”。这两章都“语焉不详”，总共 16 页，还不到第三章“孔子”的三分之二。这正好印证了蔡元培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序”中所说，“中国民族

^① 大同馆 1903 年 4 月初版。以后多次改编改版。

的哲学思想远在老子孔子之前”，胡适只不过嫌麻烦来了个“截断众流”而已。可见，从老子孔子开始讲中国哲学史，在国内从《三字经》四书五经开始发蒙的顾颉刚等看来是大逆不道，值得“造反”一番，而在当时日本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哲学史学界来看，只是一件再普通平常不过的事了。

我并不是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有抄袭之嫌，因为同样的事当时在鲁迅先生那里也同样发生过。上世纪 20 年代，陈源（西滢）曾指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了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鲁迅和胡适一样，都是把当时已经流行于国外而在中国尚属新鲜的文史哲体系（中国是“文史哲不分家”和尊崇三皇五帝四书五经）搬运来中国，再加上些自己的东西。因为中国那时新文化运动才开始几年，新的东西层出不穷、应接不暇，拿今天时髦的话来说，胡适和鲁迅只不过在“与国际接轨”而已。

然而胡适的王充赞美确实是一个大发明。那种只顾把王充塑造成“科学精神”的典型而去从《论衡》断章取义不顾其余的做法，以及对汉代思想界和政治的肆无忌惮的贬低^①，在今天我们把王充从神坛拉下之后，就会发现是多么地牵强附会。单说一点，我们知道，王充的思想中最重要的是他关于“命”的论述和“颂汉”的论述。而胡适在《王充的论衡》中的前半部分讲王充的科学精神时，居然没有一处引用《论衡》的前三卷十五篇的“命”论诸篇。而在后半部分讲王充的自然思想和其他哲学思想时，居然把王充的“命”说成是唯物主义，甚至还想说

^① 胡适在《王充的论衡》一文中对汉代的攻击有：“那时代是迷信的儒教最盛行的时代”；“检直（原文）是一个灾异符瑞的迷信时代”；“汉代的大病就是‘虚妄’；汉代是一个骗子的时代”云云。现在看来这只是那时汉代思想研究还不发达的反映。

4 王充新八论续编

是“史的唯物论”（后来拿笔把这几个字画上叉了）。于是我们从中得出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如果我们每个要了解王充思想的人，如果从《论衡》的第一篇文章开始读起的话，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出和胡适以及唯物主义派同样的结论来。

我在本书的《王充的客观天命论》中也曾指出过，其实，说王充是“科学精神”的体现，和说他是“唯物主义者”以及“无神论者”一样，当我们去掉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这样几个公式：

唯物主义 = 先进的、革命的、好的、优点

唯心主义 = 落后的、不（反）革命的、坏的、缺点；

无神论 = 先进的、革命的、好的、优点

有神论 = 落后的、不（反）革命的、坏的、缺点

的话，说王充是“科学精神”的体现、是“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是“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之类的近似于孩子们判断是非的判词而已。关键是这些标签和封号还和王充思想不符，无异于“指鹿为马”。

我在《日本的王充研究论著目录编年提要》（台湾知书房出版社 2005 年版）“自序”的结尾部分曾如斯写道，这里将之引用，作为此“自序”的结尾。

（今后的王充研究）不要将“杂家”或者说是“全才”之王充以及《论衡》，放入一个“王充是什么什么”这样的简单框架之中。不要用特制的“过滤嘴”（Filter）、“滤色镜”式的东西去“过滤”“衡量”“套”看待王充以及任何思想家。

其次，我们从日本的王充研究中得出的一个教训是，不要将王充的“自画自赞”（日语，翻译为中文是“自诩”）

之词，特别是《论衡》“自纪篇”和“对作篇”中对自己的才能、伦理道德、品格节操以及对《论衡》的“自我评价”和“我的文章写得如何如何好”之类，就那么用来作为对王充的客观评价。这一点本来是不言自明的，“王婆卖瓜”的话值得信吗？然而日本的（或中国的）王充研究中这样做的学者却大有人在，应该引以为戒。

再次是不要将王充和“汉代”这个大环境隔离开来。王充是汉儒之一分子，其思想系统和基本概念，像“天”“气”“命”“阴阳”“五行”“鬼”“神”之类，都不能不打上“大汉”之时代烙印。譬如王充所说的“气”，说王充是唯物主义者的同仁们无不予以“气”=“物质”=唯物论之类的评价；然而事实上，王充的“气”和汉儒们所说的阴阳五行之“气”根本就没有什么差别。换言之，讨论王充的思想根源，既要注重历史，更要注重王充的时代。这方面的研究日本学者做得就比较好。

最后是最简单的，也是人们经常忽略的，作王充研究，一定要从《论衡》的第一篇读起，不要从最后的“自纪篇”肇始，也不要受某些中国哲学史教科书的影响，断章取义，“各取所需”。

以上的一些关于方法论的原理和教训其实非常简单，可以说不但是王充研究，也是整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常识吧。用日语说这叫“初心”、“公正心”、“平常心”。

是为“自序”。

邓红

2005年12月27日于日本大分